



深研博收 芳馨播远 ——初读《镇江历史文化大辞典》

□ 孙润祥

《镇江历史文化大辞典》的出版发行,是镇江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喜事。笔者有幸,得以先睹为快。

这是一部充分发挥群体力量,既集镇江历史文化之大成,同时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的著作。本辞典由市委书记杨省世、市长朱晓明分别作序,钱永波主编,全市十多个部门的100多名人员参加编写和审核,其中有各方面的学者专家。这项工作历经5年、6易其稿,方告完成。全书198万字,图189幅,收列词目及其说明文字共3200条,分自然、历史、人物、城建、名胜、教育、科技、文体、医卫、文学、艺术、军事、民族、宗教和友好城市等16部,另有镇江及各辖市建置沿革概况和与镇江口岸有外运业务关系的国家、城市及地区等两个附录。本辞典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引用和参考的各类资料达300多种;同时又紧密结合迅速发展的社会现实,及时补充了各部门的最新建设成就和理论研究成果。全书跨越时间之长,涵盖领域之广和分列部类之多,都超越了以前的同类著作,从而把镇江的历史文化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本辞典对源远流长的镇江历史文化、对产生历史文化的自然环境、对创造历史文化的人物活动,都有相当完整的反映。全书取材翔实,论述精审,具有严谨的学术性;同时条理清楚、语言晓畅,又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本辞典也是一部镇江历史文化的普及读本,能增强全市人民进一步了解镇江、热爱镇江、建设镇江的意识。全书展示了镇江江河交汇、山水相绕,具有自然形成的环境优势。以西周宜侯夨的年代算起,已具有3000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浩瀚的太空中,从这里升起了祖冲之、沈括、茅以升等璀璨群星。现实征程上,润扬大桥横跨天堑,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蚕、桑种植资源保存库的建成等成就,显现出今日镇江的魅力。作为一名镇江市民,在了解这些以后,你不能不心潮激荡,能不决心为镇江的未来发展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吗?

本辞典较完整地反映了镇江及其各部门的历史和现状,作为一部资料性和知识性兼备的工具书。广大读者可以充分利用本书资源,了解镇江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增加知识积累,丰富个人的精神生活。本辞典还能为许多部门的具体业务工作服务。如宣传部门、旅游部门、对外联络部门要向国内外介绍和宣传镇江;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教学要补充乡土教材,都可以从本书中汲取大量有用的资料。

本辞典以发掘深入、材料丰富成为镇江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坐标和新平台,她将对未来镇江的历史文化研究起到推动作用。对后来者的工作,特别是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知识资源。后来者参照这个坐标,充分利用这个平台向上攀登,无疑将会从中汲取许多正能量。

这是一部具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著作。以前内地和台湾地区曾经出版过《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辞典》《楚国历史文化辞典》《邢台文化历史大辞典》和《台湾原居民历史语言文化大辞典》等。但以省辖市为单位,以辞典形式全面反映其辖区的历史文化面貌的并不多见。可以说,《镇江历史文化大辞典》的出版,在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领先一步,亦可为这方面辞典的编写起到促进作用。

话说奸雄刘裕

□ 徐卫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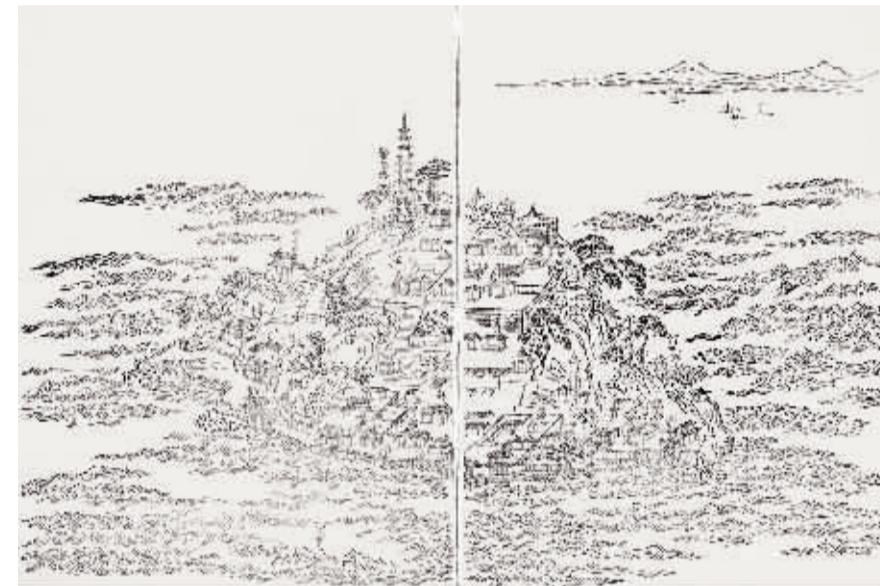
镇江底蕴深厚,人文荟萃,得山水之胜,钟灵毓秀,代不乏才。众所周知,历史上曹操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实际上,在我们镇江籍的名人当中,有一个人更符合奸雄这个称号,他是百年难遇的军事奇才,勇猛无比的沙场勇士,足智多谋的无敌统帅,城府极深的狡猾政客,是一个曾让四个王朝灰飞烟灭的王国征服者,更是一个曾将五位天子送上西天的皇帝终结者。他,就是被誉为“南朝第一帝”的宋武帝刘裕。

刘裕(公元363年—422年),字德舆,小字寄奴,东晋末年军事家、政治家,亦是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刘裕是地道的镇江人,初为“北府”将领孙无终的司马,在平定孙恩之乱中展现军事才能,后来首倡大义,推翻篡位的桓玄,再造晋室,获得极高的声望,并在不久之后掌握朝政。刘裕先借南燕南侵出兵灭燕,随后又平定卢循之乱,在朝中铲除了刘毅、诸葛长民及司马休之等异己,巩固了其不可动摇的地位,接着对外平定蜀王谯纵,北伐后秦,收复洛阳及关中地区,受封宋公并获得九锡,最终建立南朝宋。刘裕一生战果辉煌,性格复杂,为乱世奸雄,北魏国政治家崔浩评价他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曹操”。

《资治通鉴·晋纪》中记载,最初刘裕的声名地位都很低微的时候,轻率狡猾,没有品行,士族名流都看不起他。此时的刘裕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古惑仔。然而,狡猾又恰恰是用兵的优点。兵法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刘裕的一生可谓将狡猾发挥到了极致,使对手无法掌握,而他却可以轻松战胜对手。就军事层面而言,看看当时两位中央执政者的军事表现,实在替他们感到汗颜。司马元显举全国之兵讨伐桓玄时,由于内心怯战,一触即溃,被桓玄所擒,徒留笑柄。而桓玄在窃取东晋政权建立伪楚后,面对刘裕七拼八凑的1700人向他发起挑战时,表现更加不堪,内心的不自信直接传达给了他的将士,结果刘裕仅仅用了67天,就让伪楚帝国土崩瓦解,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以少胜多、以弱击强、出奇制胜俨然就是刘裕的代名词。可以这样说,刘裕从当初一文不名的京口古惑仔,最终成长为宋武帝,一生经历的困难实在太多,但他都是从容面对,努力化解。不管是刚出道时的以一击千,还是消灭南燕后的建康保卫战,莫不如此。

《泊船瓜洲》与金山及宝觉

□ 乔长富



清代金山图

北宋王安石(1021—1086)的《泊船瓜洲》脍炙人口,品析它的文章不胜枚举。综观一些代表性的说法,人们似乎都忽略了隐含于其中的诗人与金山及宝觉的情结,因而对诗的内容缺乏更为全面深入的理解,对诗的写作时间也是见仁见智,各执一词。其实,对于《泊船瓜洲》与金山及宝觉之间的关联,王安石自己在《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王安石全集》卷28诗中就有相当具体清楚的表述:

“老子陈迹倦追攀,但见幽人数往还。
忆我小诗成怅望,金山只隔数重山。”

“世间投老断攀缘,忽忆东游已十年。
但有当时京口月,与公随我故依然。”

“与公京口水云间,问月何时照我还。
邂逅我还还问月:何时照我宿金山?”

这3首诗,从作者自称“投老”即临老,以及回忆“十年”前与宝觉重逢于金山,可以确知当作于晚年退居江宁(今南京)以后。诗人以回忆与宝觉重逢于金山为基点,抒发了他对金山的怀念,表达对宝觉的浓厚友情,同时又隐含对个人遭遇的感慨。王安石与宝觉在金山重逢,是在他第三次游金山,应召赴京为翰林学士,开始迈向政治生涯的顶峰之时。他“年少”时初游金山,曾自比为“孤根”金山,表达他的宏大志向,此次入京后不久就升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革新,实现了他的“孤根”之志。所以,金山以及此次与宝觉重逢于金山,对于他有特殊的含义,他对金山和宝觉有特殊的感情。

对于与宝觉交往的情况,王安石在《赠宝觉并序》的序言中说:“予始与宝觉

相识于京师,因与俱东。后以翰林学士召,会宿金山一夕。今复见之。闻化城阁(在金山)甚壮丽,可登眺,思往游焉。”《王安石全集》卷36从王安石诗文及清代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等的记述看,王安石当是嘉祐年间(1056—1063)与宝觉“相识”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嘉祐八年王安石因母亲去世归江宁守制时,宝觉当与之“俱东”;治平四年(1067)九月王安石被召为翰林学士,宝觉当时已在金山,王安石赴京途中因而与之“会宿金山一夕”;两人分手以后,直到王安石退居江宁时,两人才又“复见”。由此看来,王安石晚年回忆的虽然只是与宝觉“会宿金山一夕”,其中却凝聚了他与宝觉多年的友情,以及与之相关

的自己人生起伏升沉的感慨。《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使我们想到了王安石的《泊船瓜洲》。它们之间,不但体裁相同,而且语意相关。尤其是“三绝”之三,连韵脚也相同,只不过“还”与“山”先后易位而已;特别是“问月何时照我还”,与“明月何时照我还”只有一字之差,显然是作者刻意所为,以强调两者的联系,突出相关的事。这一事实当是:作者所以在写作于治平四年以后的《泊船瓜洲》中问“明月何时照我还”,是由治平四年王安石与宝觉在“京口口水云间”即金山共宿时,宝觉曾对王安石“问月何时照我(王安石自指还)”。这一点,对于我们确定《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以及深入了解

诗中所包含的思想感情,有重要意义。

首先,以往推定《泊船瓜洲》的写作时间,人们都是联系王安石的仕历,扣住“春”和“还”寻找答案。而对于“还”,或理解为“还朝”,因而推定诗作于王安石熙宁七年(1074)四月罢相后赴江宁经瓜洲时;或理解为“还江南”,因而推定诗作于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再次拜相赴京经瓜洲时。两种说法,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则显示“明月何时照我还”是由宝觉“问月何时照我还”变化而来,可见“还”只能是指“还江南(含金山)”,表明《泊船瓜洲》只能是作于熙宁八年二月离江南赴汴京时。到2014春天,上距王安石作《泊船瓜洲》,为940年。

不但如此,以往依据熙宁八年二月赴京分析诗意图时,往往简单理解为诗人在抒发厌倦仕途,思归江南之情。《与宝觉宿龙华院三绝》则显示,诗人通过眼前问讯“明月何时照我还”与当年宝觉在金山“问月何时照我还”的映照,表达对金山和宝觉的怀念之情,以及表达由于此次赴京是“倍道赴阙”(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不能绕道金山相会,只能在瓜洲与金山和宝觉隔水相望的惆怅之情;同时,王安石在治平四年被宝觉“问月何时照我还”时是春风得意,而王安石熙宁八年经瓜洲问“明月何时照我还”时已经经历过政治挫折,对仕途有厌倦之意,他于其时变宝觉当年“问月”为今日自己“问月”,其中自不免有对仕途升沉的感慨在内。要之,根据《泊船瓜洲》变化宝觉当年问月为自己今日问月,联系王安石的诗文和仕历,我们在“以意逆志”解读它的诗意图时,看到了它的更为丰富深入的内涵,看到了诗人对金山和宝觉的一往情深。

重阳节风俗三题

□ 陈 静

后天就是重阳节,翻读宋代女词人李清照《醉花阴·九日》中的词句“佳节又重阳”,想起了重阳节的一些风俗。

重阳节的起源

农历九月九日是“重阳节”,为何称之为“重阳”?因古时“九”为阳数,两九相重,故谓“重阳”。

重阳节风俗的起源,最早可以推到春秋战国时期,屈原《远游》诗中,就有“集重阳入帝宫兮”之句。就古城镇江而言,重阳节风俗可谓源远流长,趣味盎然。据元代《至顺镇江志·岁时》记述,重阳节有“登高、饮葡萄、带(茱萸)囊、饼面糕、插彩旗”等俗,并援引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茱萸以系臂、登高、饮酒,祸乃可消。”可见上述风俗,起初是为“避邪”,后来逐渐演进,如“登高”,就成为人们在节日中游山玩水、陶冶情操的野外活动。

由于九月九日正巧是二九相逢,

重阳节的登高

重阳节自古就有“登高”的风俗,晋代周处《风土记》中记述,“以重阳相会,登山饮酒,谓登高会。”

“城市山林”镇江,重阳登高远眺,佳处比比皆是,诸如金山、焦山、北固山、招隐山等,而最佳登高处,当首推北固山多景楼;此楼依山而建,临江屹立,极目长江,波涛万顷,百舸争流,远看焦山峰峦秀丽,近听江水惊涛拍岸,正如清代多景楼楹联所云:“天与雄区,欲游目骋怀,一层更上;地因多景,喜山光水色,四望皆通。”

至于重阳节登多景楼的诗词,我很欣赏宋代方岳《水调歌头·九日多景楼》,其中词云“问讯重阳烟雨,俯仰人间今古”,读来十分熨帖,使人感受到天下第一江山迷人的魅力。

重阳节的重阳糕

重阳节应景的美食是“重阳糕”,吃重阳糕这一风俗最早的记述,见于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以糖面蒸糕,

上以猪肉羊肉鸭肉为丝簇钉,插小旗,名曰‘重阳糕’。”

重阳糕的“糕”与“高”同音,口彩是“吃了重阳糕,百事俱高”;小孩子吃了重阳糕,“品学俱升,步步登高”;它迎合了人们的节日心理,故代代相传,沿袭至今。老镇江出售重阳糕的茶食店最有名的是爵禄、福禄全、太平村、一品香等,其制作的各色重阳糕有米粉松糕、青梅蛋糕、松粉糯米糕,这些重阳糕外形美观,质地酥松,美味可口,惹人喜爱。时下有些糕点店制作的重阳糕,糕面加点栗肉和食用红绿丝,比较简单,应景而已。

我小时候和小伙伴们过重阳节,一面啃着重阳糕,一面挥着小彩旗,那嬉逐追奔的情景,虽已过去七十余年,却依然恍如昨日。



重阳节物:辟邪翁与长寿客

□ 邹伯芬

与其他节日一样,重阳节也有传统节物,是为“辟邪翁”茱萸和“长寿客”菊花酒。对此,《西京杂记》有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

南朝吴均《续齐谐记》里的一则传说,也可以说明重阳佩茱萸、饮菊花酒的起因:东汉的费长房学道成仙,能知过去未来凶吉事,有个叫桓景的年轻人慕名寻访,拜为师父。一年九月初,费长房郑重其事告诉桓景:“重九之日,你家将有灾厄降临。”桓景大惊,求解方法。费长房指点道:“是日清晨,你一家老少离家登山,用茱萸盛于口袋或系在手臂,喝菊花酒,可驱凶保平安。”桓景照办,天不亮离家,直到半夜回家,只见家禽牲畜悉数暴死。此事不胫而走,远近皆知,自后每逢重阳,人们皆带茱萸登山,饮菊花酒,以避灾厄而求吉祥。

茱萸是中药的一种,重阳前后成熟,色赤红,味辛烈,有驱虫去湿、逐风邪、利五脏、祛病辟厄之功效。其药用价值,多种古籍中有记载,如晋代周处的《风土记》:“茱萸,色赤可采也,平生山谷,治心下邪气,去三虫。九月九日折茱萸插头上,辟恶气御初寒。”

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更把茱萸美称为“辟邪翁”:“今世人以茱萸浮于酒饮之,盖茱萸名辟邪翁,服之以消阳九之厄。”

茱萸辟邪的功效,也引起了帝王的兴趣,早在汉朝时,重阳这一天,皇宫里的后妃王子,均要折茱萸或插于头上,或系于手臂,或佩于腰际。为鼓励臣下忠君报国,皇帝还要将茱萸赏赐给文武大臣。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是唐朝王维在《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的诗句。这“遍插”二字,可见重阳节时茱萸之必不可少,无怪乎古人又把重阳节称作“茱萸节”。

菊花又称“长寿花”,因为它“春生夏茂,秋华冬实,备受四气,饱经霜雪,花槁不零”(语出《本草纲目》)。其功能散风清热,平肝明目,故两汉时,人们就以服食菊花求延年益寿。另外,《风土记》《荆楚岁时记》等古籍中,都有“九月九日,饮菊花酒,令人长寿”的记载。

《风俗通》中,还有一则菊花能延寿祛病的神奇故事:汉时南阳郡县一山谷里住着三十多户,长寿者一百二十岁,中寿者百余岁,下寿者也有七八十岁。因为山上有野生大菊,山民长年饮用浸泡了菊花的山泉之故。消息传出,患有风眩病的司空王畅、太尉刘宽,令郡县地方官供给此种山泉,不久,风眩病居然好了。

